

生命之美

自然美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领域。自然蕴含着生动、丰富、深厚的美育资源，人人都可以从中发掘美、欣赏美。同时，自然也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直观的“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我们能够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汲取其孕育的力量与品格。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在原始状态下，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强调人类按照大自然的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

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写道：“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①在景观美的范畴中，这是人人都有权利享有的审美资源和人生追求。

一、自然风光之美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沈从文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乡土与纯粹的自然风光进行了大量描绘，开篇写道：“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的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在沈从文的眼中，“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

^① 蔡元培. 美育与人生[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22：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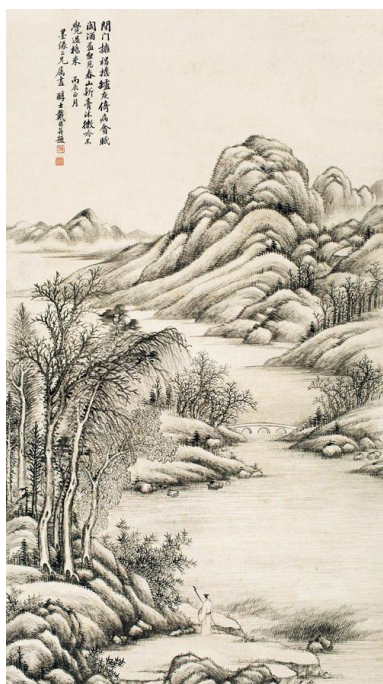
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



[清]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

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描绘了不同时节自然风光的不同韵味和特点，“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清晨前往，黄昏归来，四季的风光各异，乐趣也是无穷无尽的。

四季山水是古代画家绘制山水画的一个重要主题。画家撷取季节特征，在作品中融入人们熟悉的元素，扩大作品的影响力。清代戴熙的《春山新沐》以草木为主要描绘对象，体现出生命的律动和活力。



[清]戴熙《春山新沐》

明代蒋嵩的《冬雪图》画出了白雪皑皑、群山寂寂的景象，一幅冬季的自然恬淡风光跃然纸上，这种自然的生命力蕴含于蒋嵩的创作理念中。



[明]蒋嵩《冬雪图》长卷局部

（一）山水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读懂了中国山水，便读懂了中国。”近水远山皆有情，山水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性格基因。山水之美，在于它与人类生命的密切关联。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山川河流等各种形态的山水景观总能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和情感共鸣。它们或雄伟壮观，或清新脱俗，或幽静深邃，或充满浪漫情怀，都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自然美。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山水也是永恒的灵感源泉。历代文人墨客通过笔墨纸砚表达他们对山水的独特感悟和审美意趣，留下了大量令人赞叹的文艺作品。

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以“三山五岳”最为著名。“三山”指的是黄山、庐山、雁荡山；“五岳”指的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中国的十大河流分别是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汉江、辽河。早期的中国文人墨客喜欢画山水，因为山水代表自然。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就是自然。在中国人眼中，山水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和无情的水。通过山水，我们可以领悟到更大的宇宙和我们的内心。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除了自然的风光美，还有人与自然相处的自然精神。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仅有意境美，而且有内涵美，这里的“南山”是具有灵魂介入、闪耀着灵性之光的自然物，是一种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统一。

那么，从对自然风光的客观描绘到将创作寄情于山水，中国人的山水情怀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这一自然观的转变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

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地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①这种对于山水题材的喜爱，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与之相关的诗词、绘画等文艺作品。

魏晋时期戴逵的《剡山灵秀图》运用工笔写意技法勾勒出东晋时期的剡地山水。剡山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溪面广阔，山水相映成趣，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清乾隆皇帝为此画题诗云：“山川灵秀称江南，伊人小隐为结庵。竹篱茅舍颇自适，云容水态曾相谳。老松落落蟠翠色，高峰矗矗烘朝岚。兴来扫笔作长幅，故知丘壑性所耽。”



[东晋]戴逵《剡山灵秀图》

剡山，位于嵊州市西北部，剡山之南，长乐江、澄潭江和剡溪在此交汇。剡山何以得名？秦置剡县，故山称剡山，水名剡溪。剡山的地势起伏如苍龙，最高峰名为星子峰，海拔 146 米，如龙头般高高昂起。南宋高似孙编纂的《剡录·山水志》中有“剡山为越面”。剡山地处剡中盆地的蒂口，“四山”之水在此汇集，流入嵊嵊峡谷。剡山宛如守护在蒂口的一条长龙，气势非凡。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带着热爱与珍惜，我们深信自然的美是真实的、有力量的，它既宽广有力，又能涵容万物。我们深感山之巍峨、水之包容，人不过是栖息于此。

（二）园林美

什么是园林？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词条，园林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 with 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丽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②。园林美是什么呢？它是指按照审美理念设计和布局，统筹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宅院建筑等元素，体现自然

①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294.

② 周武忠. 园林美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2：2.

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统一性的园林艺术。园林美是一种将自然风景、建筑形式、人居环境、诗画艺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美、整体美。我们认为，园林美的本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对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中国园林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北京故宫旁边就有“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圆明园和颐和园是清代皇家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①中国现存著名古典园林多为明清两代的遗物。我国的“四大园林”包括苏州的拙政园、留园，承德的避暑山庄以及北京的颐和园。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集中在江南，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分别代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艺术风格，被称为苏州“四大名园”。清代广东“四大园林”也被称为岭南“四大名园”，分别是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和佛山梁园。

皇家园林是皇帝和皇室私有的大型园林建筑，古代称之为苑、苑圃、宫苑、御苑、御园等。按照使用情况来看，皇家园林分为日常休憩的大内御苑、近郊暂住的行宫御苑和相对远离皇城的离宫御苑等。私家园林是指官僚贵族依附住宅所建造的风景园林，古籍中称之为宅园、别业、园亭、池馆、山庄、草堂等。寺观园林是寺庙道观的附属园林，一般包括寺观内部庭院和外围地段的园林化环境等。除这三种园林外，中国传统园林还有衙署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陵寝园林、风景名胜园林和公共园林等非主流园林。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林方向发展。天人合一与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道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满足精神生活与实现自我解脱愿望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魏晋时代也是中国园林美学的转折时期。园林的三种基本类型，即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都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移情山水、倡导隐居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社会风尚，同时也激发了知识分子阶层对自然山水的重新认识，并从审美的角度去亲近和理解自然。南齐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②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居的园林兰亭，是一座晋代园林，同时也是体现“江南文化”的著名场所之一。

明代画家文徵明画的《兰亭修禊图》中，环境静谧，建筑、人物、植物刻画得极为细腻，丘壑连绵，树林葱郁。弯曲的流水将兰亭环抱其间，山峦皴擦简练，用淡干墨渲染表现山石纹理。临流水而坐的文人似在谈诗论道，姿态各异，目光却都集中于溪流上顺流而下的酒觞。

① 宗白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② 谢赫：南朝齐梁时期画家、绘画理论家，著有《古画品录》。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关于寺观园林，南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朝洛阳寺观园林最为详尽。园林紧邻寺院，如宝光寺、崇觉寺等。南朝城市寺观园林也很普遍，建康（今南京市）的同泰寺就是著名的佛寺之一。佛教盛行，玄学兴起，城市园林不仅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居民公共活动的中心，游园活动盛极一时。寺庙和道观的纷纷修筑，带动了寺观园林的发展。南朝时，仅建康就有六七百座寺庙，诗人杜牧以夸张笔法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



江西九江庐山——东林寺

中国古典园林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是意境。“意”为园主的思想感情，“境”为园林景观，一是建筑与自然的融合映衬，二是建筑与人的情趣承载。意境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园林深受山水诗画的影响，布局讲究诗情画意。造园时不仅要有优美的自然山水构图，更要有深刻的立意。中国古典园林素有“凝固的诗、立体的画”之称，诗、画、

园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意境实际上就建立在文学艺术的基础之上。清代书法家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苏州的拙政园有两处赏荷的场所：一处名为“远香堂”，引用周敦颐《爱莲说》之“香远益清”；另一处则名为“听雨馆”，取自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运用不同的诗词含义营造出不同的意境体验。园林中自然风光的布局颇具诗意，诗词对景进行描绘，二者之间互相吸收，相辅相成。可以说，离开了诗画，源远流长的园林文化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美除了诗画，还与林木、建筑、山水等相关，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山石的应用分为真假山石之美，而水体的应用较为广泛，主要体现为动静水体之美和倒影之美。动态水体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灵动之美与静态水体则带给人幽静、禅意之感。倒影之美把园林的意境之美烘托到了极致，林木的倒影与水体形成新的景象，将园林意境以简练、极致的方式推向高潮。建筑和自然景色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意境的多样性。林木与建筑也有多种联系，会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氛围。南宋画家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描绘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亭台楼阁在山水间的不同趣味。同样，园林中的建筑搭配不同的四时之景，亦可营造出园林在不同时刻的独特意境。比如，苏州拙政园听雨轩院内有小池塘、芭蕉和翠竹。在园林中，芭蕉和竹子多植于雅室之外，在意境上，芭蕉种在窗前，人们不仅可以获得“雨打芭蕉”的听雨乐趣，其本身还有顽强、平和的象征意义。

园林建筑之美是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满足人们的生活使用需求，又满足人们对自然美与环境美的追求。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提到，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引导我们“游”，而且引导我们“望”），就是“行”，也同样要“望”。^①这体现的是中式古典园林“以小见大”的传统。此外，园林建筑中还采用多种手法来布置空间，如“借景”。通过布置、组织、创造和扩大空间等手法，丰富的感受，创造艺术意境。宗白华先生引用沈复的话说：“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以此概括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征。

总之，园林空间的意境形成是一项跨维度的成就，需要在理性中融入感性，既要为文人雅士找到思想归宿，又要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因此，除草木、山石、花鸟等元素外，中国园林建筑的意境营造所体现的美感经验离不开人的精神创造。中国人的审美范畴极具诗意与特色，一砖一石便能映照出对人生与宇宙的无限想象。虚与实的层次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借由意象在心中的作用，突破象限，继而产生意境。园林建筑本身只有材质、规制、大小等区别，仅具有物理性质，但却能被赋予情感和精神。园林建筑的参

^① 宗白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与打破了人与景之间单纯的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利用这种巧妙构景产生的意境，让想象悄然进场，物的形象因此承载了人的情趣，即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反映。“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蕴含着人的精神观念的植入，而不仅仅是一种景观装饰。因此，园林建筑具有引导抒情的作用，不仅可以抒情，还可以起到移情的作用，它可以表现人的个性和情趣。园林建筑通过这种方式在由物象转化为意象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独特形式表达，这就是园林艺术的独特美感。所以，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营造同样映衬着人的需求，通过自我营造，可以呈现心中的美好意象，陶冶情操。

二、人文风俗之美

（一）人文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美丽中国”不仅包括自然之美，更应当包括人文之美，或者说它是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融合的存在。一个国家，只有青山绿水，没有文明礼貌以及雍容典雅的大国人文气象，是无法持续积累软实力的。所以，生态文明应该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美丽中国”包括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不仅有自然遗产，更应当有文化遗产，这是一个整体，国家也正朝着这个完整性发展。

“人文”指民众的精神面貌，它同样需要随时观察，并通过诗书礼乐的教化不断提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指不同的地方因当地资源、环境不同，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不同的脾气秉性、肤色外貌。中国的人文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道德的关系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民追求的是朴实厚重的情感，向往的是美美与共的大同境界，这也要求中华文化必须具备海纳百川的特性。

《论语》第二章第二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中，“思无邪”就是真情流露、毫不作假的意思。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诗经》可以用来培养感情、明辨是非、完善人格。汉儒认为，《诗经》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意义。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参天大树的话，那么树根就是《诗经》。我们可以从《诗经》中体味各个方面的人文关怀：有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同情和关注，有对人的个性张扬的赞颂，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忧虑和关怀；有对最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关注，有对高层次精神世界尤其是情感世界的表现和抒写；等等。《诗经》从三个维度展现出立体的人性，文字虽古老，但人性、人情不会因斗转星移而有所改变，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恋人情、兄弟情、家国情，一片片情怀构建起永垂不朽的华夏文明。也正是这些情怀守护着每一寸山河，维系着每个人心中的家国。

东晋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今有沈从文的《边城》。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于现实中构建桃花源或乌托邦，是一代代文人不竭的梦想与怀乡冲动。沈从文描绘的抒情诗般的风俗画卷，不仅构成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同时又与作品中光彩夺目的人情美交相辉映，把一个犹如世外桃源般的“边城”世界装饰得如梦如幻。《边城》中湘西的人情、自然和风俗都在展示着沈从文向往的淳朴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营造出一支清新悠远的乡村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的理想境界的想象。

由此可见，人文美是一座村庄、一座城市的灵魂，能够让我们所处的一方水土更有温度和内涵。以人文美推动文明深化，才能更富有特色与活力。

近年来，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质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唐宫夜宴》《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等蕴含了浪漫悠久的东方美学品格；《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等塑造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人世间》《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塑造了时代中“不普通的”普通人，平凡又伟大……这些彰显了文化自信的影视艺术作品有效助力了人文美的传播。

（二）风俗美

“听其言则知其风，观其乐则知其俗。”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以风俗来规秩序、引风尚、聚民意、治家国、正人心的优良传统和灿烂文化。风俗中有大爱。礼产生于俗，绵延几千年的中华礼文化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礼仪活动。礼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道德思想。孔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里仁为美”“君子怀德”“见贤思齐”等，都是民俗的基本准则。中国民俗中的儒家思想，是炎黄文明、华夏文明传承的结果。涿鹿之战后，炎黄文明被推向中原，在华夏大地不断发展、弘扬，逐渐演化出华夏文明。

中国传统民俗，如舞龙、舞狮和剪纸，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传统民俗的传承与创新，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更是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传承方面，剪纸艺术保留了其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技法，如剪刀或刻刀在纸上的剪刻技巧，以及不同纹样的寓意和象征意义等。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保证了剪纸艺术的独特性和魅力。剪纸，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承载着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这一艺术形式以纸张为媒介，通过剪刀或刻刀的巧妙运用，创造出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图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传承方面，剪纸艺术严格遵循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技法。手艺人运用剪刀或刻刀，在薄薄的纸张上细心地剪刻出各种纹样，无论是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还是吉祥图案，都体现了剪纸艺术的精湛技艺和深厚内涵。这些纹样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如蝙蝠代表“福气”，牡丹象征“富贵”，喜鹊寓意“喜庆”等。

剪纸艺术的传承不仅仅是对技艺的继承,更是对文化的传承。每一幅剪纸作品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剪纸艺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舞龙、舞狮是中国传统民俗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传承方面,舞龙、舞狮保留了其传统的表演形式和技艺,如龙头、龙身、龙尾的制作工艺,以及舞龙、舞狮的表演技巧等。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保证了舞龙、舞狮文化的原汁原味。舞龙、舞狮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璀璨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古以来,它们便是中国人欢度佳节、喜庆丰收的重要仪式之一,无论是在春节、元宵节还是其他重大庆典活动中,都能见到其身影。

在传承方面,舞龙、舞狮严格遵循传统的表演形式和技艺。制作龙和狮的工匠凭借精湛的技艺,精心打造出生动灵活的龙头、龙身和龙尾,以及威武雄壮的狮头、狮身。这些工艺品不仅外形逼真,而且细节之处也极为考究,如龙头的龙眼炯炯有神、狮头的毛发丝丝分明,展现了工匠的匠心独运。

在表演技巧上,舞龙、舞狮更是讲究形神兼备。舞龙者通过默契的配合,使龙在空中翻腾起舞,时而盘旋上升,时而俯冲而下,仿佛真龙在天,气势磅礴。舞狮者则通过生动的表情和灵活的动作,将狮子的勇猛和威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时而跳跃,时而翻滚,与观众互动频繁,使整个表演充满了欢乐和喜庆的氛围。

此外,中华服饰文化也是源远流长。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华民族素有“衣冠王国”和“礼仪之邦”的美誉,无论是先秦的冠冕深衣、秦汉的紫绶金章,还是魏晋的褒衣博带、隋唐的幞头胡服,或是两宋的直脚幞头、清代的顶戴花翎等,不同时代的衣装都与礼制有着深刻的联系。正所谓: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

除了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服饰研究还可从材质、工艺、色彩、类别、制度以及穿着者、不同民族等方面进行区分,是一个浩瀚而复杂的体系。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服饰呈现出强调服饰与人、环境的和谐统一,注重服饰的精神功能并将其道德化、政治化,以及体现民族融合、具有独特的传承性等特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服饰向多元化发展,国人在自由的氛围中充分发挥智慧和创意,打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在新时代,传统服饰文化精髓仍以新的面貌大放异彩。汉服、唐装、旗袍不断掀起流行热潮,体现出人们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寻古典之美的热情,也说明中国传统服饰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深入了解和把握民俗,可以明晰各种民间文化、弘扬美德、陶冶情操、传承文明、增长知识,让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例如,我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各类节日,以及各地极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乡土文化等。这些节日和风情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凝聚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二节 如何敬畏生命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孕育。

一、有温度的医学

医学既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又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医学是有温度的，是人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通过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人类的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者要有爱心，懂人情，明事理，要深刻诠释“性命相托”的凝重。要想读懂医学，就要感受医学充盈的人文关怀，它深刻，它真诚，它是对疾病、生命、死亡乃至人生的清醒认识，它不仅是经验的、逻辑的，同时也是哲学的、审美的、人文的。医学文化应该是“求真、求善、求美”，是求真的认识观、求善的价值观、求美的艺术观的有机结合。当代医务人员要学会倾听，融入患者的生命，与患者产生共情和共鸣，将患者的感受转化成自己的表述，并再次转化到患者心中，将医学人文真正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以人为本”。早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三龙相拥一人”的实物，就是“以人为本”最直接的证据。中医学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强调“敬畏生命是天道，治病救人是天职”。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倡导治人先于治病，关注标本，厘清主次。

“仁爱”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已深入到仁人志士的血液之中，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利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有“医乃仁术”之说，并提出“医以德为尚”。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认为，医者首先要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情怀。西晋哲学家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代医学家裴一中强调，“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足见古代医家把“仁爱救人，赤诚济世”视为医学的最高境界。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中写道：“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者不仅要重视人的生物属性，更要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及情感需求。医者的职责就是要尽己之力去帮助患者，减轻其痛苦。就像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所说：“我们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病人，但我们会认真治疗每一位病人。”

现如今，医学科普、医学科幻作品逐渐兴起，它们也被注入了浓厚的医学人文色彩。对“疾病”的关怀、对“健康”的审视再度成为话题，对于生命的思考是医学科普需要关注的问题，而这种思考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医学本身的。因此，将这种对医学的思考和反思传播给公众时，我们必须将医学科普的主题深化，将对医学本质的思考纳入其中。人类不应该追求永恒的生命，而应该追求生命的意义和健康的生活，医学更应

该追求人类的健康福祉。关于疾病的思考，不仅仅是指个体的生命，还包括群体的生命。

关于医学科普，如何让形式与内容不只是简单地还原医学知识，而是注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向公众传播“有温度”的医学，是当下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医学科普与医学诊断有本质的区别，医学科普更应定位于让公众从更广阔的视域理解生命、健康、疾病的本质，理解医学的发展，在面对健康问题时能够更理性地做出判断。

医学科幻作品中经常探讨当把生命置于更大的人类存亡之际，应该做出怎样的思考和进行怎样的自救过程。例如，关于流行病的作品在欧美一直比较流行，如《生化危机》系列。需要关注的是，在我们传播医学观念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自身而忽略疾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当人不断地逼近死亡时，才能深切体会生的含义”。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中对流行病的描述。流行病作为一种对生命的威胁，让人们陷入了不安，但也正因有了这种不安，人们对幸福的向往与生活价值的探讨才有了现实的意味。在“流行病文学”这个分类体系下，有些作品能够让受众感受到人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在流行病之下的人性，如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和威廉·萨摩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面纱》等作品。其中，加缪的《鼠疫》不但逼真地描绘了鼠疫时期的那种人与人的割裂，也描写出了疫情之下疾病的随机性和医学的不确定性带给人类的冲击。

在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医学生的培养，更是要基于生命教育与医学创新教育。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新理念谋划医学发展”“以新定位推进医学教育发展”“以新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进一步推动新医科建设进入提档升级新阶段，在医学生的培养和医学教育的发展上，强化“生命至上”理念，着力培养有“温度”的医学生。良好的医德是当代医学生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必备元素，这也是当前落实立德树人素养的核心内容。以敬畏生命伦理作为良好医德之铺垫，引导医学生在学校教育阶段形成缄默知识，如“生命至上”的医学人文底蕴，让生命敬畏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对自然与人的敬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中华民族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形成和发展了如耀眼星辰般璀璨且多样的传统文化，其中不乏生命观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中提到的“两个结合”思想，高校的生命观教育也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生命观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对于当今大学生个人及国家民族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18.

“三生”思想，即“贵生”“共生”“生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敬畏生命观相关思想的核心。“贵生”即认为生命至高无上，提倡敬重、珍爱生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敬畏生命观思想的基础理论；“共生”崇尚和平共处，百花齐放，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互相理解包容，是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生生”是敬畏生命观的最高追求，内在地包含着“贵生”“共生”，追求在传承和创新中实现长远发展。这些生命观在时间的长河里经过大浪淘沙，历久弥新，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标志。

对人类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基础了。从出生起，我们就生活在自然中，最后也回归自然。自然的任何变化都改变着我们的体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人类觉得自己能大规模地填海造地，在地上挖湖，把山头削平，想怎样就怎样。从表面上看，人类是很有力量的，但比起大自然，人类的力量就显得非常渺小。人类破坏大自然，大自然就失去了平衡；而大自然为了找回平衡，就会有“大动作”，像山洪、地震、海啸、龙卷风、强暴雨、极冷、极热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无节制开发的报复。当你不了解大自然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类是地球的主宰；当你沉下心来了解大自然后，你就会知道大自然的力量多么强大了。^①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自然，自然孕育了人类，并让人类生生不息。自然生命是早期中国人崇拜与敬畏的对象。生殖崇拜是人类早期文化的核心，包含女性生殖崇拜和男性生殖崇拜。在母系社会，人们崇拜女性，或是崇拜女性的生殖器官；而在父系社会，则是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虽然都是生殖崇拜，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

生殖崇拜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本能的释放，是对自然的敬畏。先民用实物资料证明生殖崇拜的可视化，不同的器物成为生殖现象和生育愿望的载体。有意思的是，这些生殖崇拜的遗迹遍布世界各地，是人类共同的原始宗教形式之一。

生殖崇拜的篇章始于女性生殖崇拜，也是对类似女性生殖器官的事物的崇拜。鱼和蛙因多子而被先民视为生殖能力强的代表，因而被绘制于彩陶上，希望人类也能像鱼和蛙一样多多生育子女。人类在蒙昧时代，并不清楚性行为和生育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女性自己就能生育，于是，先民就把繁衍的功绩归功于女性，歌颂女性的生育能力。

原始社会后期，先民的生命意识深化，父权制逐渐确立，人类也逐渐意识到男性在繁衍中的作用，于是，男性生殖崇拜逐渐取代了女性生殖崇拜。同样，男性生殖崇拜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印度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男性生殖器官的造像，被称为“林伽”。黑格尔认为，人们应该关注“塔”形建筑的文化内涵。在印度常见的柱状尖塔就是由生殖器状的石坊演化而来的。这类“塔”形建筑在中国也普遍存在。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仰韶彩陶的特点是动物形象和动物纹样多，其中尤

^① 李凌. 自然的美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44.

以鱼纹最普遍，有十余种。闻一多在《说鱼》中提到，鱼在中国语言中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但闻一多最早也只说到《诗经》《周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进一步追溯到仰韶彩陶呢？像仰韶期半坡彩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人类自身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即种的繁殖，是远古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①

新石器时期中国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反映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殖崇拜。河南汝州市出土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大型彩陶缸，其主体图案为一只鹳和一把石斧。



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大型彩陶缸

图案中，鹳的嘴里叼着一条鱼。在 6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代先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而捕鱼的过程充满了艰险。鹳是一种以鱼为食物的水鸟，它那自然进化而来的捕鱼能力要远远胜过当时缺乏先进捕鱼工具的人类。这图案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崇拜这种水鸟。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蛙纹图案。古代先人之所以崇拜蛙，一方面是因为蛙作为两栖动物不怕洪水，又能在陆地上生存，有着突出的临水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蛙的繁衍能力很强。还有一种说法是，“蛙”与“娲”谐音，而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她繁衍了人类，因此，蛙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女娲，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这种生殖崇拜观念一直传递到晚近

时期，例如，民间年画中经常以石榴的形象来寓含对“多子”的期望。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李泽厚认为这个时期是“人的觉醒”的重要阶段。“《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②。

人生只有一次，生命又是人生一切价值的基础和载体，因此，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然而换个角度看，生命在大自然中又是那样渺小和脆弱。大自然的一粒尘，落在个人身上便是一座山。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因此，我们对生命，特别是对处于弱势、需要帮助的生命，应该倍加珍惜、尊重和关爱。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今天对弱势生命的态度，或许影响到将来当你处于生命弱势时，别人对你的态度。人文，是人类独有、为人而存在的一种精神现象，就像《哈姆雷特》中的台词：“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是因为人不仅有生命，还有思想、有灵魂、有尊严。人之存在，不仅凸

①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6.

②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6.

显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姿，而且创造了宏阔悠远、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第三节 人生的意义该如何追寻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过这个命题。从古至今，随着时代变迁，一代代仁人志士、文人墨客用他们的故事影响着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诠释着人生的意义该如何追寻。当代人该如何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旷达与洒脱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魏晋风度指的是从三国时的魏至两晋时期，再到南朝宋时期，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他们的超然风貌为后世文人树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格风范，影响了一代代文人的精神走向和价值选择。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了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②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③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如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被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多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

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洁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而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为目的，即见戴逵并非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图》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的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二、出世与入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来描写诗词写作的境界，这句话也包含了他关于人生的思考与体会，遂被广为传颂。入乎其内，所以入世体会红尘；出乎其外，所以超脱于世领悟。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追寻从未停歇。其中，出世与入世自古以来便引领着无数文人墨客在心灵的旷野上寻觅归宿。出世与入世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处世方式和人生追求。出世，通常意味着超脱于世俗、功名利禄，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内心的宁静与自在。而入世，则是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参与到世俗的事务、功名利禄的追求中，掌握社会规则，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提出，尽管庄子“在入世，却与不存在世间一样，他的眼光永远是超凡脱俗的，超越了‘形骸之外’”，将道家哲学定义为“出世主义”。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儒家有关入世的特点加以论述，他提出“儒教便是属于凡人运用的理论，适用于人世间”，由此将“入世”界定为“适应世界及其秩序和习俗”。而在对道家思想的“尽可能不干预（无为）”的描述中，将“出世”界定为“神秘主义的与世无争”。

（一）儒家学派的“入世”进取

儒家对“入世”的观念体现得最为明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提倡。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提倡仁、义、礼、智、信。首先，孔子以仁为思想内核，以仁爱、爱人作为做人的最高标准和处事准则；强调修身学习，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重视礼乐教化，强调礼以修身，“以礼让为国”；推崇仁政，强调德治，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礼崩乐坏”之下，从个人角度来说需通过礼乐教化自省修身，从国家的角度需要施行仁政，落实德治，从而恢复西周的礼乐盛世。孟

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主张性善论和以民为本，倡导以仁政为核心的王道思想，认为统治者施行“王道”便可得人心、得天下。儒家“入世”思想表现为：以“道”自任，积极入仕，希望能够匡扶救世，平治天下，亲身践行救世之“道”。孔子 55 岁开始周游列国，历经卫、宋、楚、郑、陈、蔡等国，希望以其仁爱思想、德治方略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游说君主，虽败而不气馁。孟子也曾周游魏、齐、宋、滕、鲁等国，向各国君主推荐其治国理论，希望以“王道”取代“霸道”，可惜也没有得到一展抱负的机会。孔子“出疆必载质”，孟子“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便是积极“入世”思想的证明。

（二）道家学派的“出世”无为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万物之源，世界之本，“道法自然”可使万物生生不息；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斗争，强调自然而然的统治，注重潜移默化、功成事遂、政治和谐稳定；主张“绝圣弃智”，贬低智术和政术，认为奢侈放纵会损害人的身心，助长人的无限欲望，从而伤害和扭曲人纯朴的自然本性；批评积极有为，宣扬消极避世，主张清静无欲，修身养德。庄子继承老子的“不争”“尚柔”思想，追求自由，藐视功名利禄，主张“无己”、“无功”、“无名”、“忘我”、清静无为、与道冥合。如果说儒家追求的是积极的入世政治哲学，那么道家思考的则是心灵超脱的生命哲学。道家追求不做帝王师，不为肉食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原系楚国公族，学问渊博，游历过很多国家，曾因躲避兵役做过九年的宋国漆园小吏，是梁惠王、齐宣王时期的名人，然而庄子无意仕途。楚威王曾派使者请庄子去做相国，庄子表示宁可“曳尾于涂中”，也不愿去做官。庄子崇尚自由，庄子的思想在那个秩序混乱的时代，是一剂安神的良药，是一片宁静温馨的光辉。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由“仁爱”推衍出“亲亲”，继而产生了以“正名”为用的“忠恕”之道和“推己及人”的“恻隐”之心，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达成治世之道。作为先秦道家代表的老子和庄子则提出“去智”“寡欲”。这一“无为”的方法进一步推衍出反对“人为”和圣人的“心斋”“坐忘”的修身方式，引导人们用出世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继而达成治世。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人生的目的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可以说，“入世”和“出世”在实质上并没有根本对立，仅仅是表现方式上的差别；在本质上，先秦儒家和道家的治世思想是互补的，二者融合发展，与其他优秀的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对人生、世界的关心，对道德价值和自然价值的追求，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丰富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遭遇精神困惑。我们需要反思和重建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社会里，个体普遍面临着人生意义危机，常常不知道生活目标是什么，不能

确定自己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常常有一种无聊感和焦虑感。自我认同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立、自我归属感的满足和自我生存意义的肯定。生活在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全球性等特征的当代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其生存环境的复杂性,还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深陷于身份感的不断迷失和归属感的日渐贫乏的困境中,在“我究竟是谁”的追问中反思着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自我认同危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描绘了当代人生存的现实状态,凸显了人类对于精神家园困境与重构的话语诉求。

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重建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呢?这个问题同时也促使人们培养面对这一困境时进行深层次思考的能力。

(1) 反思与确立人的自我存在范式。自我存在范式指的是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以及如何调适自我与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整体性关系。当代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就是理性自我的存在范式,最大限度地追求功利和个性自由,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同时也把精神的困惑推向了极致。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实现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和合为基准,始终持守住一种“合理适应”,这种适应使国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不至于严重分裂。因此,审视国人的自我存在范式和中华文化发现,认同伦理自我和生态自我的最高形态的存在范式是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策略。伦理自我的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是渺小的,但如因自己的贡献推动社会进步,人就不再渺小,而是伟大和崇高的。孔孟及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就将“仁”和“义”确立为自我的存在范式。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了“为仁”的主要目的是“立己”。老庄及后期道家则一直推崇、倡导和践行生态自我的存在范式。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思想就要求构建一个有序的、良性的、永恒的自然万物和合共生的生命系统。“天人合一”进一步反映了古代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合共生”思想的终极旨归。解决当下社会精神家园危机需要确立的自我的存在范式是伦理自我与生态自我的合理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解现实功利的欲念及外在目的的限制,从而实现精神的终极皈依。反思人的自我范式是为了实现人的心性的需求和寻归精神家园的需要,是寻找安身立命场所的心路历程,最终通达精神家园的生存境界。

(2) 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使人们获取了许多关于确定性的知识,满足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却也向人们揭示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精神家园和谐重建依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在前进而不是在倒退,科学发展是能够接受理性批判的,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在批判中沿着日趋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才能解决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我们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同生物界一样,经历着从无序到有序的进化过程。“科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它必然增长,也可以说,它必然进步。”从巴西的库里蒂巴,我们可以论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制造出不伤害大自然的能源,人类也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资源浪费,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最终重建和维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

(3) 建立以制度和道德维护社会的信任体系。当代社会,人们不得不超越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模式,对非个人化原则和陌生人的信任成为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

这种抽象的信任系统也极易造成个体的信任危机，使整个信任体系遭遇挑战，进而破坏精神家园的和谐。因此，人们需要构建有效的制度来应对传统“特殊化信任”体系的弱化，同时也需要对传统道德的信任，通过对信任的信任来弥补抽象制度“不可触性”的缺陷。在制度和传统之间建立一个合作的桥梁，互相依存和统一，有效制度与传统道德的结合有利于提升个体对“陌生人”和“他者”的认同感，是培养大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平台，是实现精神家园和谐重建的坚实基础。

本章微课视频

